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聖經翻譯研究的基本問題和方法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Ren, Dongshe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4-21 20:21:40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50">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50</a>

# 圣经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

任东升

**内容提要:**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和传播呈现“征服文化”色彩,即文本翻译和传播宗教的政治意图明显。圣经翻译又是一项“双重任务”,既要准确无误地保留神的信息又要翻译成读者明白无误的语言。加之圣经翻译成为一种“运动”或“工程”,其社会复杂性独具特点。对圣经翻译的研究一直伴随着圣经翻译实践,在当代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主要阐述圣经翻译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和四种研究方法。

**关键词:**圣经翻译;基本问题;研究方法

**Bible Translation Studies: Basic Issues and Methods**

**REN Dongsheng**

**Abstract:** “To conquer” has been a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Bible translation worldwide, implying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both translating the biblical text and spreading Christianity globally. Bible translation is also a “dual

task” in its preserving of God’s message without misinterpretation while making it properly understood by way of rendering the message into languages appealing to readers. In addition, to translate the Bible means a “movement” or a “project”, which entails complicated social factors. Studies on Bible translation have almost kept pace with its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and now they continue to be a focus of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efforts. This paper elaborates five basic issues and four major research methods concerning Bibl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Bible translation; basic issues; research methods

宗教具有排他性,宗教文本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趋向和鲜明的文化异质性,这使得宗教文本的翻译十分复杂。圣经是世界主要“文本宗教”基督教的经典,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和传播呈现“征服文化”<sup>①</sup>色彩,即文本翻译和传播宗教的政治意图明显。圣经翻译作为一种“运动”和“工程”,其社会复杂性独具特点,加之圣经翻译对“高举基督”和“属灵语言”重要性的强调,使得圣经翻译现象错综复杂。本文主要阐述圣经翻译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

## 一、圣经翻译的基本问题

圣经翻译的基本问题涉及圣经文本观、翻译的政治、神学性翻译、真义和语言的矛盾、翻译的社会复杂性等几个方面。

### 1. 圣经文本的“彼岸”性质

对宗教原典的诠释是宗教翻译的最基本问题。这是因为圣

---

① 任东升:《圣经汉译与佛教翻译比较研究》,《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第46—50页。

经这样的文本在其信仰群体圈内被视作具有能“拯救灵魂”的性质,因而具有“彼岸”色彩;“神圣作者性”或曰“无作者性”成为圣经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宣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用奈达(Nida Eugene)的话说,圣经是“神语人言”。<sup>①</sup>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翻译认识的逻辑便是:因为圣经是神圣文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便成为翻译和传播圣经的首要目的,由此产生了“听—写”式的翻译,甚至“逐字翻译”,即圣经翻译的“忠实”原则,要求圣经译本的首要功能是具有与“原本”同等的塑造信徒身份的权威。

## 2. 宗教翻译中的政治问题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其政治色彩浓烈程度超过佛经或古兰经的翻译。基督教的派别之分与它们对圣经诠释的不同主张密切相关,为了显示自己教派的区别性特征,各派努力把自己遵从的圣经文本“标志化”。天主教和新教的圣经文本从书卷数目、篇名、人名、地名到神学术语系统都有很大差别。天主教认为,圣经文本只有经过罗马教廷的解释才能成为教徒的最高权威;而反对这一主张的新教认为,圣经文本自身就是教徒唯一的最高权威。在前者一统天下的局面下,有违于罗马教会权威的圣经解释被视为“异端”,私自翻译圣经或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就指责为大逆不道。新教势力发展到18世纪后,展开了以“圣经唯一”为宗旨的传教运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翻译和传播圣经。以致圣经翻译超越了翻译本身,演变为一种宗教政治:谁掌握了诠释权,谁就可以操纵圣经的翻译。

## 3. 神学性翻译和人本主义翻译之分

翻译宗教文本固然是人类的书写行为,但宗教翻译的指导原

---

<sup>①</sup> Eugene Nida, *God's Word in Man's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2, 1.

则和译本语言的取向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原文观”而论,圣经是“神的话语”还是“人的语言”?就“翻译语言”而论,是传达“文本奥义”还是考虑“可接受性”?就“作者—读者”关系而论,是以“神圣作者”为中心还是以“普罗大众”为中心?就翻译价值而论,是基于“神本主义”还是基于“人本主义”?我们可以称前一种取向为“神学性翻译”,后一种取向为“人本主义翻译”。

公元前3至前2世纪出现的《七十士希腊文本》(*Septuagint*),其翻译过程类似译者对“神的话语”的“听—写”。公元5世纪初,《通俗拉丁文本》(*Vulgate*)的译者哲罗姆提出“圣经翻译用直译,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sup>①</sup>译者出于对“上帝之言”的无比敬畏,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对圣经原文极端“忠实”,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这样的圣经翻译传统至少延续至10世纪圣经的民族性译本出现之前,此为“神学性翻译”阶段(*the realm of theology; the religious/theological sphere*<sup>②</sup>)。

从14世纪开始,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采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人认为,“神”是普通大众的神,“神的话语”也应该是普通大众能够明白的语言,因而采用意译的方法。这种译法对圣经原文多有不够“忠实”之处,但是译本具有民族语言特色,满足了民族文化的需要,此为“人本主义”的圣经翻译。到了当代,基督教新教机构为了在全世界普及圣经而大规模翻译圣经,其翻译采用的是“动态对等”的方法。50年代以来担任联合圣经公会“圣经翻译工作组”主席的奈达甚至允许把“上帝的羔羊”译为“上帝的海豹”,实际上是把“人本主义”的圣经翻译观推向了极致。

神学性翻译和人本主义翻译这两种取向在当代世界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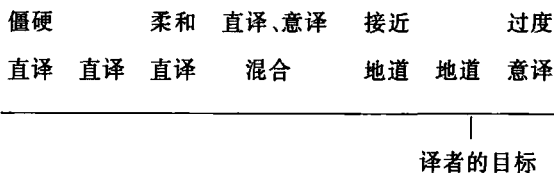
①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页。

② Andre Lefevere,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Susan Bassnet and Andre Lefeve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24.

的圣经翻译中依然十分明显。仅以当代圣经汉译实践为例,香港环球圣经公会以张达民博士为主的圣经重译,强调译者的基督徒身份且“高举基督”、重视“属灵语言”,而华人语言学家冯象的圣经翻译,是一种基于“翻译圣经与信仰无关”的立场进行的文学化翻译。

#### 4. 圣经真义与语言之美的矛盾

宗教连接着超自然的信仰对象和广大信众,所以宗教翻译是一项“双重”任务。正如巴斯奈特所言,圣经翻译既要保持圣经真义又需追求语言之美。<sup>①</sup>如何在“真义”即宗教观念和“语言之美”即读者的接受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呢?美国学者密尔得雷德·拉尔森用下图表示了圣经翻译对“地道”<sup>②</sup>的追求:



在圣经翻译史上,确实出现过上面这个连续统两端代表的极端翻译。哲罗姆针对文学翻译用意译而主张“圣经翻译用直译”<sup>③</sup>,本雅明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就是圣经的行间对译(interlinear gloss)”<sup>④</sup>,实质上都是“僵硬直译”的做法。而奈达曾举例说可以

①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hir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51.

② Mildred Larson, “Factors in Bible Translation”, in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Ed.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1-53.

③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第26页。

④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1923, Tr. Harry Zhon, in *The Translation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15-23.

把“上帝的羔羊”译为“上帝的海豹”，则是“过度意译”。

奈达基于对圣经翻译的研究提出了“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两种翻译方法。前者指“源文本的形式特征在接受语中被机械复制的翻译特性”，后者指“原文信息转移到接受语言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的反应基本相同”。<sup>①</sup>20世纪后半叶以来翻译出版的几部重要的圣经英译本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sup>②</sup>但是，在圣经翻译中究竟是保持“形式对应”还是遵循“动态对等”，即接近原文的句法和词汇，还是照顾译文读者，采用地道、流畅的译语，依然存在分歧。

### 5. 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复杂性

如果从社会学视阈考察圣经翻译，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它堪称“运动”：传教目的明确、声势浩大，历时两千年；规模化的人力财力投入；体制化的翻译资助、组织、程序和发行；系统化的翻译理念、原则、术语、译本等。我们不妨称这种有专门资助、通过组织机构实施的翻译事务为“机构性翻译”(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ion)。<sup>③</sup>

传播基督教需要借助对圣经文本的反复更新和普及，“圣经公会”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组织机构。18世纪，受路德宗“虔诚派”和“大觉醒”的启发，新教开始了全球性的“传教运动”，远在亚洲的中国也成为传教士的重点传教地区，圣经汉译遂蓬勃展开。现代圣经出版运动源起于1804年3月7日成立于伦敦的

① Eugene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 Leiden: E. J. Brill, 1964, 165.

② John Gabel and Charles Wheele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2-245.

③ 任东升、裴继涛：《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8—84页。

“英国及海外圣经会”，即“大英圣书公会”，其宗旨是：扩大圣经的传播范围；出版和发行圣经；译本不加评论或注解。随后，美国、俄国、苏格兰、荷兰等地的“圣经公会”成立。由于传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世界性的“联合圣经公会”于1946年在美国纽约成立，圣经翻译和传播工作在一百二十七个国家展开。

来华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组织机构是不同阶段的圣经“译委会”。新教圣经于1807年随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最初是个人主译或二人合作翻译，中国学者从旁协助，进行文字润泽。从第二代传教士翻译圣经开始，各类“译委会”组织起来，专事圣经的汉译。如先后出现的“四人小组”、“五人委办小组”、“南京官话译委会”、“北京官话译委会”等，时至“和合本译委会”，规模达到最大。

圣经“译委会”是西方基督教团体自主设立的翻译组织，没有固定的译经场所，所有译者并不集中在同一个地区。委员们来自不同的差会，除了从事圣经汉译工作，还负有传教的义务。各个委员会并不突出译者个人的权威地位，主席和委员的地位平等，存在翻译分歧时，通过投票的方式解决。圣经汉译委员会以在华传教士大会、执行委员会、翻译委员会、协调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修订委员会（或保存委员会、审阅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裁审委员会等为依托，通过委员会之间的平等合作完成翻译计划，具有横向性，也是西方国家组织形式在“译委会”中的体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三个汉语圣经全译本：天主教《圣经》（“思高版”，1968）、《现代中文译本》（1979）和《圣经新译本》（1992），都是各自的翻译机构通过多团队间的分工协助制作完成的。这些机构的运作因涉及人才招聘管理、金钱账目往来、各种协作会议、出版发行筹划等“非翻译事务”，而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质，致使宗教文本翻译的社会复杂性不言而喻。

## 二、圣经翻译研究的方法

宗教翻译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做出理论上的突破确有一定难度。已有研究中,除了奈达对圣经翻译的理论探索外,中国学者在圣经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圣经重译的理念与实践、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sup>①</sup>近年来,华人翻译家在圣经重译的理念和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如冯象“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翻译”<sup>②</sup>、“翻译圣经与信仰无关”<sup>③</sup>的思想,王汉川“准确逼真、顺达流畅”<sup>④</sup>的圣经重译原则。针对这两位学者的圣经新译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成果,多位高校硕士研究生围绕圣经汉译问题做出了可贵探索。<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的团队申报的课题“希伯来圣经翻译注释与研究”获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这表明圣经重译及其研究确已引起高度重视。

圣经翻译研究涉及神学、宗教学、解经学、哲学、历史学、人类

- 
- ① 任东升、门沈:《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51—56页;任东升:《圣经汉译与佛教翻译比较研究》,《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第46—50页;任东升、裴继涛:《结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第78—84页;任东升:《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外语研究》2010年第4期,第69—74页。
- ② 彭伦:《冯象:把〈圣经〉当作文学文本来翻译》,《南方周末》2005年1月14日。
- ③ 颜菁:《冯象:重译圣经,无关信仰》,《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20日。
- ④ 王汉川:《心灵牧歌——〈四福音书〉鉴赏大全·后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253—254页。
- ⑤ 芮淑妍:《当代圣经文学翻译:理念与实践探索——以冯象〈创世记〉和〈约伯记〉译本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唐晨芳:《阐释学视角下的〈圣经〉汉译研究——以冯象、王汉川〈圣经〉汉译片段为例》(硕士论文),武汉:武汉大学,2011年;袁倩倩:《厚翻译:当代圣经汉译的文学化倾向——以王汉川〈四福音书〉译本为例》(硕士论文),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

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版本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等众多相关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较多借用这些相关学科的方法。以下是几种常见的也是比较简单的研究方法。

### 1. 描述性研究法

“翻译是目的语的文化事实”<sup>①</sup>,以“目的语”为导向的实证研究,就是只把“译文”当成跨语际传递中既成的文学现象或文化现象。这就是描述性研究的思路,与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相对。

具体到圣经翻译研究,描述性研究就是对圣经文本翻译活动所呈现的方式、历史和翻译文化现象加以系统描述,并以圣经翻译的“功能”、“过程”、“译作”等为导向,把圣经翻译活动放到文明进程、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加以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指导宗教翻译实践,也不探讨圣经翻译的标准,不作价值判断,而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作为“文化翻译”或“翻译文献”的宗教翻译现象。此种研究的对象涵盖圣经翻译的一切现象和已有的、真实的翻译行为,包括圣经文本翻译的外在因素,如译作、规定性的圣经翻译思想和理论、赞助机制、机构组织、译者运作模式、出版发行等,甚至包括参与圣经翻译活动的相关人士的陈述,译作的批判性评价。

### 2. 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综合运用

归纳法是由个别概括为一般、由部分综合为整体的思维方法。研究者通过观察宗教翻译史上不同的事实或事件,提出某个问题而非任何确定的模式或假设,从自然开放的观察开始,根据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过滤,概括出一般的形式,最后产生假设。一个假设要上升到理论命题,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论证。

圣经翻译现象十分复杂,伴随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悠久的圣

---

<sup>①</sup>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9.

经翻译实践史,留下了丰富的圣经翻译思想遗产和译作。运用归纳法研究圣经翻译,就不能只停留在历史陈述或感悟体会的层次上,而是要提出条理清晰、可以反复论证的理论命题。探索圣经翻译的理论,就需要爬梳和利用圣经翻译史的丰富材料,将针对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圣经文本翻译问题、同一派别的圣经文本在不同时期的翻译问题的观点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见解。

与归纳法相对的演绎法是根据某一理论提出假说,或从归纳得出的假说出发,通过观察或实验来验证假说,由此获得研究的新视角或者新知识。演绎研究的优点在于论证严密,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研究者通常是根据某一理论、他人的观点,或根据对事实材料的归纳分析,提出假说,然后论证。

归纳法适合探索性研究,演绎法适用于验证性研究。综合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圣经翻译史、圣经翻译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从微观层面进行多译本比较、译作评析、个案考察和调查报告写作等。

### 3. 比较法

比较法是通过对照、对比、比较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得出相似点和不同之处的分析方法;相似点说明翻译现象的共性或某种规律,不同之处说明两者或多者背后深层次的差别,涉及性质的、类别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甚至根源性的异质性缘由。比较方法很适用于圣经翻译研究领域。如通过比较圣经汉译史上第一篇译序《圣经之序》与佛经汉译史上第一篇译序《法句经序》,可以分析出两种宗教翻译传统的异同以及差异背后的宗教理念根源。再如,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视点,考察佛经翻译和圣经汉译的组织机构,可以比较、分析、归纳出“机构性”宗教翻译的共同特征,揭示出两种翻译传统差别背后的文化差异根源,以及宗教理念与翻译政策之间的关系。

#### 4. 语料库研究法

语料库语言学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强调真实的语言,包括口语文本和书面文本。语料库可分为“可比语料库”、“平行单项语料库”、“平行双向语料库”。语料库不是研究目的和对象,而是一种研究途径和方法。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挑选合适的语料库,以得出有效的结论。语料库就像一架显微镜,能使研究者更科学、更细微、更具体地探究翻译现象背后翻译主体的文化心理、翻译语言的选择倾向、目的文化对翻译行为的制约等。目前,语料库方法主要用于探究翻译语言的现象。海外中文圣经学者已经参照西方研究成果(如 Zondervan Pradis Lexicon System),建立了“原文字汇、词性与文法分析系统”(Chinese Bible Online Parsing System),另有“网上查经”检索系统,输入圣经外语译本的一句经文,就能查到多种汉语版本的相应译文,方便做简单的比照参考和比较研究。这两种检索系统与斯特朗圣经原文编码系统(Strong Number)有相似之处。上海交通大学的语料库研究人员拟建设圣经语料库,以便于开展圣经翻译问题的研究。然而,由于圣经“原本”意义上的“蓝本”纷杂,某些语言表述各不相同,这样的圣经语料库会存在某些先天不足,语料库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尚待确定。

对圣经翻译的理论研究一直伴随着圣经翻译实践,在当代,圣经翻译研究是国内外研究者都十分关注的大课题,其“空白”还有很多,过去被视为学术“禁区”的话题或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重视。圣经翻译理论集大成者奈达的理论表述涉及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化人类学、信息论、交际理论等现代理论,我们进行较为全面的圣经翻译研究,可以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事实上,即便是“圣经诗歌汉译的文学化”这样的文类翻译研究、“论严复的圣经片段翻译”这样的个案研究,也离不开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密切

结合、历时和共时研究的有机统一。圣经翻译研究不是西方宗教学者和翻译学者的“专有”领地,我们理当打开思路、博采众长,把我国的圣经翻译研究尤其是圣经汉译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翻译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和宗教翻译思想。代表作包括: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国家“十五”重点图书),教材《圣经文化导论》(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论文《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亚卫”神名译法的标志性意义》、《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等。

(责任编辑 程小娟)